

经贸交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效用分析

赵 凯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两岸的经贸交流始于 1987 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之时, 30 多年的经贸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深入, 也产生了一系列溢出效应。本文在回顾两岸经贸交流历程的基础上, 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这种经贸交流的溢出效应, 并从创新两岸经济合作新模式、深化政治互信、提高两岸的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水平, 加快建立共同管理机制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经贸交流对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面效应。

关键词 经贸交流 溢出效应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2016)02-0011-05

2015 年 11 月 7 日,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 习近平在致辞中说到: “曾几何时, 台海阴云密布, 两岸军事对峙, 同胞隔海相望, 亲人音讯断绝, 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 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2008 年以来, 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过去七年, 台海局势安定祥和, 两岸关系成果丰硕, 两岸双方和广大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1]。”1987 年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 开始历史性的交流, 1993 年,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四十多年来的首次会晤, 迈出了两岸关系发展中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在两岸政治对立的大背景下, 经济交流这一手段被首先采用, 经过 30 多年的交往历程, 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台湾经济之于大陆, 还是大陆经济之于台湾, 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也是在经济交流的促进下, 两岸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交流才得到蓬勃发展, 可以说, 经济交流既是先导, 也是基础。如今,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新阶段, 经济交流也面临着一些新形势和新问题, 怎样在新阶段继续发挥经济交流的作用, 既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也是夯实两岸交流基础所需。

一、两岸经济交流历程简介

收稿日期 2016-02-01

作者简介 赵凯, 男,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一)两岸关系接触期(1987~1995)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国共之间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内战, 在这场战争中, 国民政府最终落败, 并于 1949 年迁移至台湾, 开启了海峡两岸对峙的时期。

1987 年以前, 两岸关系处于敌对状态, 台湾尚属于戒严时期, 对中国大陆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两岸的经贸交流因政治的对峙几乎全遭禁止。1987 年 11 月 2 日, 台湾“行政院”通过“复兴基地居民赴大陆沦陷区探亲办法”, 这项政策为两岸关系开启了新页, 使得海峡两岸在隔绝近 40 年后, 出现了良性互动的契机, 步入了民间交流时期。

由于 1987 年台湾方面开放对大陆探亲, 再加上 1986 年新台币开始对美元大幅升值, 使原已面临台湾生产成本上升的传统产业遭遇竞争的压力, 选择以产业升级, 或借由政府的解严措施与开放探亲政策, 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 台商大举到大陆投资, 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过, 此阶段由于台湾当局开放厂商以间接方式经由第三地对大陆地区进行投资, 因此, 此一阶段属于间接经贸交流的时期^[2]。

(二)两岸关系停顿期(1995~2000)

1995 年, 由于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台海危机”

使得两岸经贸交流陷于停滞,1996年8月,李登辉更是提出必须检讨以大陆为腹地来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点,同年10月21日在“国统会”会议上提出针对大陆的“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政策,并要求两岸的经贸往来要考虑政治风险,要求台商赴大陆的投资要在合理规范的框架下进行,并提出“西进暂缓,推动南向,台湾优先”的经济政策,这标示台湾方面对大陆经贸政策的大调整。在“戒急用忍”政策的指挥下,台湾方面放缓了两岸经贸交流的步伐,并且对赴陆投资建厂的台商进行严格审查,两岸经贸交流几乎陷入停顿。

(三)两岸关系政冷经热期(2000~2008)

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两岸政治关系止步不前,甚至几度出现僵持和紧张的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的两岸经贸往来则持续扩大。2000年陈水扁刚上任时,主张“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为了配合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持续扩大开放两岸的经贸往来。

从2000年至2008年,两岸经贸交流的进展相当迅速,以台湾对外贸易而言,中国大陆在2002年以后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2003年以后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3]。两岸经贸往来能够突破政治因素限制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陆对台政策所产生的“磁吸效应”,另一方面,民进党“上台”后,政局的混乱和两岸关系的紧张导致台湾的投资环境和整体的竞争力受到严重的损伤,在此种情况下,外资及岛内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持续低落,内部消费急剧萎缩,企业纷纷外移海外寻找出路,加速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4],从而形成了“政冷经热”的现象。

(四)两岸关系迅速交流期(2008 迄今)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一系列重大历史性突破,初步实现了正常化、机制化和制度化。

在两岸和平发展新格局下,台湾当局也更积极地与大陆签署各项经贸协议,推动海、空运直航,开放陆客、陆资和陆生来台,开展两岸金融合作,为台湾经济带来可观的和平红利,在视大陆市场为台湾经济出路的政策思维下,2014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983.1亿美元,台湾对大陆顺差达1039.5亿美元^[5]。但同时,两岸的经贸交流也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

台湾中下阶层对两岸经贸交流无感和台湾青年一代对大陆“以经促统”的担心,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是两岸双方今后应为之努力的方向。

二、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

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两岸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方面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台商带给大陆的资本、制造业技术及管理经验对大陆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促进了台湾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都是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两岸的经济合作模式多是台湾的公司提供资金、技术以及销售渠道,大陆的分公司则依靠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台湾对外经贸循环从过去“日本提供技术——台湾加工生产——外销美欧市场”的“传统三角模式”转变为“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美欧销售”的“四角模式”^[6]。

与此同时,两岸大量的经贸往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外溢出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两岸经贸交流的政治效应

政治议题一直是两岸关系中的敏感领域,同时也是最复杂的领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沿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路径,通过和平发展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回顾两岸30多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经济交流与合作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主要体现在政治互信增强、两岸政治层面交流制度化等方面,比如在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初期,由于两岸的交流缺乏专责机构和制度化的协商,但同时又面临着经贸交流和文教交流所产生的纷繁事务性问题,因此,代表官方的民间机构——海基会和海协会就应运而生,两会的交流不仅奠定了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还为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陈水扁上台后所推行的“台独”分裂路线,严重干扰了两岸的经贸交流,在此背景下,2005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

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7]。此后,两岸事物主管部门(国台办和陆委会)也于2014年实现会面,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和马英九更是实现了两岸分治60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面。

这种由民间到官方、由低级到高级的政治交流都是在两岸有一定的经济交流基础上产生的,大量的经济往来使得两岸双方对彼此都产生较强的依赖性,同时两岸经济的一体化在政治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两岸政府在面临两岸问题时都能够更加务实、更加谨慎的处理,也使得两岸的领导人采取较为温和、稳定的政策^[8]。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使两岸成为日益紧密的经济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不仅可以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有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发展,但经济一体化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充分条件,还需要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意愿与积极行动^[9],正是这种客观需求推动了两岸交流往政治议题的发展。

(二)两岸经济合作的文化效应

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合作能够在政治阻隔下迅速扩展,主要是得益于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基本价值观相通。两岸经济合作,无论是共识凝聚,还是立场协调与沟通磨合,往往是通过两岸同胞在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基础上,在一种近乎“一切都在不言中”的方式中进行的,反映了两岸同胞共享文化价值观念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动力效应^[10]。

相对于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和政治方面的差异而言,两岸在文化之间的共同语言相对较多,同属于中华儒家文化下,不涉及政治的文化交流显然更具有弹性,同时其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

两岸经济合作的文化效应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交流不断增加和文化产业合作的不断发展,在文化方面,两岸文化交流模式呈现多元发展,既涉及政府各文化单位,也涉及民间团体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比如在两岸分别举行的书画名家精品展、文博会、艺术论坛、文物交流展、图书交易会、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等都属于这一类;而在教育方面则主要体现为两岸教育交流、陆生赴台和台生赴陆不断发展,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1985年至2007年,前往大陆就读本科以上的台生总数为14907人,近两年人数大幅攀升,仅2009年到大陆读本科的台

生就有6775人,而2011年台湾首次招收大陆学生,就有134所院校招收2141名陆生^[11];在文化产业方面,2008年马英九执政不久,即于11月27日上午召开的第五届台湾文化总会上提出将深耕本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放弃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文化台独”政策,加强与大陆文化交流,尤其是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拉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在2009年7月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提出了深化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增强两岸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七点建议^[12]。两岸的文化产业合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在诸如民族共同语言、文学、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层面上广泛辐射两岸民众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对于凝聚两岸民族共识、文化共识、政治共识都有潜在的重要意义。

(三)两岸经济合作的社会效应

两岸经贸交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社会团体和民众两个层面,形成了两岸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社会交往格局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参与广泛的社会交往态势。

两岸打破隔阂尤其是2008年以来,两岸之间的社会交流明显加速,一方面体现在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论坛的召开,比如于2013年6月在厦门、漳州、福州、泉州、南平和平潭等地举行的第五届海峡论坛,共有台湾22个县市、37家主办单位、30多个界别代表和基层民众近万人出席;于2013年10月在南宁市举行的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推进ECFA后续协议商谈和落实、加速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实施、深化两岸金融合作、农业合作与科技合作等19项共同建议;于2013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两岸民间和平论坛,论坛就两岸政治关系、两岸涉外事务、两岸安全互信、两岸和平架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这些论坛的举行不仅标志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了两岸主流民意认同,而且彰显了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另一方面在两岸民间人员往来上,自2008年7月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来,两岸旅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两岸双向旅游交流人数从2008年的470万人次,增至2012年的792万人次,年均增幅14%。在赴大陆旅游的台湾游客人数增幅缓慢并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人数却从2008年的5.5万人次,快速增至

2012年的197万人次,年均增长105%^[13],旅游业日益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主渠道。

三、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的外溢效应的路径思考

(一)适应两岸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两岸经济合作新模式

自1980年代中期后,台湾由工业化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转型,大陆则步入工业化加速时期,两岸不仅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高度互补,而且土地、劳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禀赋也高度互补,互补优势是推动过去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的主要动力^[14]。但如今,这种经济互补传统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升高,两岸传统要素价格互补优势减弱,尤其大陆制造业快速发展、产业体系日趋完整态势下,两岸在制造业领域由过去高度互补转向局部竞争性发展。目前从两岸经济发展阶段上看,台湾已步入服务业社会,大陆正处于由工业化向服务业社会转型的启动阶段,两岸经济阶段步入新的互补时期。

面对这种新情况,两岸原有的合作模式已不能满足共同发展的需要,两岸经济合作也必然进入新常态。因此两岸应进一步在广度、深度和高度上多维度探索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如面对两岸产业的局部竞争性问题,就需要双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推动自由化,降低两岸货贸关税,扩大双方市场准入,深化两岸服务业合作,建立更高水平的政策互动平台和机制,加强双方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的沟通与协调,减少和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此外,还可以探索上海、福建、广东、天津自由贸易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等的对接模式,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两岸经济共同合作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衔接的适当方式、模式和可行途径。加快两岸新兴产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创新合作模式,使两岸间形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发展、共同繁荣,使两岸经济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物质基础^[15]。

(二)坚持共同政治基础,深化两岸政治互信

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岸政治互信的高度,同时,经济合作对促进政治互信又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两岸在重大政治议题

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当前,这种分歧对两岸进一步的经贸交流产生了制约作用,一方面两岸政治互信不足制约两岸经济深度合作,如两岸产业合作的合理分工布局难以全面展开,大陆的资金、商品入岛还有诸多限制;二是受政治团体及媒体鼓动,岛内部分工商团体担心两岸经贸交流会冲击岛内相关产业与就业,形成“恐中”心态。

而提高两岸双方的政治互信,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任何党派、任何政治人物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流,此外,还需要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之间甚至两岸领导人之间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以及时处理两岸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因沟通不当而造成不良后果。两岸的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愿,个别政治人物和党派如果妄图破坏两岸之间已经形成的和平发展机制,不仅会使台湾走向错误道路,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提高两岸的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水平,加快建立共同管理机制

从2008年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转型与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密切相关,经济合作的制度面与市场面已浑然一体。2008年以前,两岸经济关系在市场动力推动下,缺乏合作机制仍然持续快速发展,但这种经验难以应用到今天的两岸经济关系。在当前全球及两岸经济变局使两岸经济关系传统市场动力减弱情况下,恰恰需要两岸通过制度安排提高自由化水平,来创造新的需求和市场诱因,注入新的动力。2008年以来,没有制度化安排,就没有今天两岸经济合作的成果,而两岸经济合作成果的延续和扩大,更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和促进。

四、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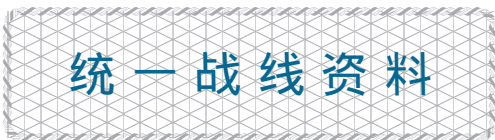
两岸的经贸往来已30多年,民进党大选的胜利也使诸多人怀疑对台经贸上的让利是否正确,笔者认为交流总会让对方看到自身的利与弊,如何在发挥经贸交流正面效应的同时尽量平抑负面效应,是当今两岸往来需面临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 [1] 丁文蕾.“习马会”习近平要论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 [EB/OL].<http://www.chinanews.com/tw/2015/11-07/7611329.shtml> 中国新闻网 2015-11-7.

- [2] 吴建忠.两岸经贸:最新时事分析与探讨[M].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17.
- [3] 吴钊燮,董振源.民进党八年执政两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C].民进党八年执政论文集台北:新境界文教基金会,2014,99.
- [4] 何柳.海峡两岸“政冷经热”现象分析:以2000年-2008年经济数据为依据[J].人民论坛,2014(12):143.
- [5] 经济七年来两岸经贸关系的总结与检讨 [N]. 经济日报(台湾)社论,2015-10-12.
- [6] 李非.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意义及影响[J].现代台湾研究,2006(02):39.
- [7] 刘舸.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7):503.
- [8] 董振源.两岸经贸交流对两岸关系互动的影响[EB/OL].中国网,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TCC/haixia/49981.htm.
- [9] 唐永红.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问题探讨[J].台湾研究,2014(3):37.
- [10] 刘舸.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内涵及其成长规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1):68.
- [11] 江迅.陆生赴台就读 转身尚不华丽[EB/OL].亚洲周刊(香港)社论,两岸公评网,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264.
- [12] 董晓.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共同建议”[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907/12/content_11696642_1.htm,2009(7).
- [13] 冽玮,陈立宇.今年前8月赴大陆台湾游客339万人次同比下降5.4%[EB/OL].华夏经纬网,http://www.huaxia.com/xw/dlxw/2013/10/3575872.html,2013(10).
- [14] 张冠华.2008年以来两岸经济合作回顾与经验总结[J].台湾研究,2015(4):27.
- [15] 单玉丽.新时期两岸经济合作的成效、羁绊与因应之道[J].亚太经济,2015(3):129.

责任编辑:任禀洁



第十二次统战工作会议(1962年)

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62年,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克服了三年暂时困难

之后的第一年。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求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2月至4月,周恩来同志先后在科委召开的广州会议(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同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周恩来同志在讲到今后统一战线的任务时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1962年4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就是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讲话为指导,来研究当时统战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由徐冰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统战正副部长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共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华北组二十七人,东北组十六人,华东组二十五人,中南组二十四人,西北组十八人,西南组十六人。

中央统战部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件文稿:(1)关于1962年工作安排的意見;(2)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李维汉同志1961年9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3)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見;(4)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处理意見。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张玮摘编)